

《大唐西域记》藏文译本刍议*

卓泽加

摘要：唐代高僧玄奘之《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古代文人对当时的西域诸国及其历史文化探索的经典名著，已有十几种版本。作为最早的译本，藏文译本经过长达三个世纪的不断完善，成为各民族共建共有精神家园的厚重文化记忆，是跨文化对内研究的重要资源，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 藏文译本 价值

藏文文献中，有诸如《贤愚经》《尚书》《战国策》《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很多从汉文译为藏文的重要文献，涉及宗教、历史、文学和哲学等领域，这类文献不仅是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各民族共建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证材料，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唐代高僧玄奘之《大唐西域记》亦是从汉文译为藏文的名著，深受历代西藏文人的青睐和推崇。

一、《大唐西域记》藏译历程

《大唐西域记》作为玄奘大师西行沿途见闻录，其佛教内容和西域诸国的情况非常吸引西藏文人。从清代至今的近三个世纪，西藏文人对《大唐西域记》的探索和翻译完善始终没有停止。

* 本文是2021年度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计划支持成果。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古藏文民间文学写本校注与研究”（21XMZ045）阶段性成果；青海省创新平台建设专项项目（2022-ZJ-T02）阶段性成果。

1. 工布查布的初译

历史上，首次将《大唐西域记》翻译为藏文的学者是清代乾隆时期的蒙古族翻译家工布查布^①（*mgon po skyabs*）。但是工布查布并未完整的翻译《大唐西域记》，而是把原文的12卷缩译为10卷。其中把第3和第4卷合译为一卷，把第6和第7卷合译为一卷，虽然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或缩译，但138国一个都不少。书名译作 *Chen po thang gar dus kyi rgya gar zhing gi bkod pa'i dkar chag bzhugs so*（可译为《大唐时期圣地印度游记》）。工布查布译本问世后，陆续被第四世敏珠尔呼图克图·坚贝却吉丹增赤列的《世界广说——大瞻部洲广说情器普明镜》（*adzam gling chen po'ai rgyas bshad snod bcud kun gsal me long bzhugs so*）和根敦群培的《智游列国漫记》（*rgyal khams rig ps bsgor p'ai gtam rgyud gser gyi thang ma*）等藏学名著引用，充分说明了《大唐西域记》在西藏学界的影响力。此外，工布查布还没有翻译《大唐西域记》原文的玄奘序，而是依照藏族传统著书习俗撰写了书首礼赞^②。礼赞中对原文的缩译也进行了说明：“顶礼无上的释迦牟尼佛！千万佛祖亲临的圣地印度，可分为五大地区。相互从属或者独立的、沿途亲眼所见或者听闻的一百五十余国的风俗习惯和地理地貌等，由三藏法师大乘（玄奘），参照唐代旧史料用汉文撰写，本人将其要义分十卷尽力翻译为藏文。”（*ston pa bla na med pa dcom ldna vds shaky thub ba la phyag vtshal lo//sangsg rgyas stong gi zhabs kyi bcags pa yi//rgya gar vphags pa'i yul la chen po lang//de dag so so'i char gtogs mi gtogs dang//lam kyi yul dang nye bar mthong ba'i yul//la sog yul gru che chung*

① 王尧先生在其《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翻译、译者和大乘上座部等几个问题述记》中指出，“工布查布有‘公’一级的爵位，蒙古乌珠穆沁部人。幼时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为仪宾（即外事官员），因而与西藏喇嘛、信徒接触，精通西藏语文。雍正帝将他留在帝都，担任西番学总理。这是专门应对藏事的研究、教学和服务于帝王的机构。他直接与宫廷接触，经常担任翻译的任务，颇有名气。到乾隆年间，陆续译出并刊布其所译经典。”见《王尧藏学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② 书首礼赞：著作正文前对佛陀、菩萨和世间神所作礼拜赞美之词，旨在消除著书立说期间的障碍。

brgya lang bcu'i//yul lugs sa tshigs grub tshul la sogs pavi//bkod pa thang
dus yig tshang rmying pa dag//bsdus te lo chen sde snod gsum vdzin pa//theg
chen lha yis rgya nag skad du brtsams//bam po bcu phrag gcig byung phal
che bavi//don rnams bsdu nas ji ltar nus bzhin du//bod kyi yi ger bri ba vdi
bzhin no)^①

2006年12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日本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长条散页装工布查布藏译本《大唐西域记》以铅印本形式出版，并且将原来的十卷按照汉文原文的十二卷分类，编辑章节目录。此外，“（工布查布）还对许多地名、寺名、塔名和山水名，进行了注释性的增译。这些注释性的增译，经过文献查找与核对，大部分都能找到相应的梵音和巴利语音”^②。然而，铅印本出版时删除了这部分注释，这对全面掌握藏译本原文的情况造成了不利。

工布查布俗称“精通四种文字”，四种文字为蒙文、汉文、藏文和满文。也有学者通过其《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一书中亲手书写梵藏蒙三文来说明四种文字中包括梵文，但其藏译本《大唐西域记》中对人名、地名、寺庙名和计量单位等保留汉语名称的音译或错译，可以推断出，工布查布对于梵文只能是不懂或者略懂，完全达不到精通的水平。工布查布的确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著（译）有《汉区佛教源流》（藏文）、《金刚手陀罗尼经》（藏译蒙）、《造像量度经》（藏译汉）、《菩提场严陀罗尼经》（汉译藏）、《蒙藏合璧大辞典》等十余部，对清代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和发展鞠躬尽瘁。

2. 噶桑格来坚参的修订

工布查布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问世，对西藏文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唐代西域诸国及佛教文化打开了新的窗口。随着对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深入学习，部分学者开始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之

① 玄奘著、工布查布译：《大唐西域记》，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第1—2页。本文作者从藏文译为汉文。

② 岗措：《〈大唐西域记〉藏译本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2页。

处。日本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藏译本《大唐西域记》题跋写道：“《西域记》收录于汉文大藏经论著部，由工布查布译为藏文。译文中某些表述不合藏语习惯，大部分西域诸国之君主尊号、山川江河之名，使用了梵文、印度俗语和方言、夷蛮土语等，此类名称在汉文中均为音译，藏文译本中保留汉语音译。对此，不甚熟悉，未敢妄加改动。对于助格和虚词的使用错误，以及不合藏语习惯的表述，对照汉文版《西域记》进行了修订。修订者为白塔寺（妙音寺）扎萨克喇嘛^①、察罕夏仲^②、噶桑格来坚参。”（sivi yus kyis zhes bya ba vdi rgya nag gi bstan vgyur du yod pa kung mgon po skyabs kyis bod skad du bsgyur ba bod skad kyi nyams ma thon pa dang/ yul gyi rgyal povi ming dang chu klung gi ming dang ri bo sogs kyi ming phal che ba samq skri ta dang phal skad dang yul so sovi skad dang kla klovi skad sogs rgya nag gi yi ger zur chag tu yod pa bod yig tuvng de ltar bris vdug pa ji bzhin mi shes pas vchos ma nus shing/ rnam dbye nor ba dang tshig phrad nor ba dang bod nyams ma thon pa sogs rgya yig gi sivi yus kyis dang gtugs te bsgyur bcos byed pa po ni mchod rten dkar povi dgon gyi ja sag bla ma cha kan zhabs drung bskal bzang dge legs rgyal mtshan no//）^③ 这段文字中噶桑格来坚参较为清晰地指出了工布查布藏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君主尊号、山川江河之名的错译及其原由，但并未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只是对藏文语法错误进行了修订。从称谓来看，噶桑格来坚参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这也从另一个维度反映出当时的权力阶层对《大唐西域记》的关注和重视。

3. 次仁顿珠的重译

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次仁顿珠于2014年开始以季羨林先

① 扎萨克：清代官名，义为总管。有备兵扎萨克与旗扎萨克。外有喇嘛为扎萨克者管辖僧众。此管在原西藏地方政府为正三品。参加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2332页。

② 夏仲：近侍。察罕活佛为清朝钦定的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

③ 玄奘著、工布查布译：《大唐西域记》，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第150b页。本文作者从藏文译为汉文。

生等的《大唐西域记校注》^①（以下简称《校注本》）为蓝本，参考工布查布译本和噶桑格来坚参修订本，依原文的卷次重新翻译了《大唐西域记》全文，题目译为 *thang san lam yig*（《唐僧游记》）。首次翻译了原文的玄奘序。翻译了必要的《校注本》注释，且附有玄奘生平传。2018年10月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总体来看，次仁顿珠译本行文流畅，层次分明，通俗易懂，符合藏文文法规律，是目前最为可靠的藏文译本。

二、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是日本大谷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教悟于1953年在《印度佛教学研究》（第二卷第1号）发表《西域记的藏文译本及其译者》（《西域記のチベット語訳及びその訳者》）。据王尧先生介绍，佐佐木教悟“是第一位利用这一写本（大谷大学藏木刻本《大唐西域记》）的学者。而且在写本前附有一册比勘表，使用方便。这里仅仅就写本的内容分布和译者情况作一简单介绍”^②。王尧先生还提到蒙古藏学家比拉博士于1973年发表了《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工布查布藏文译本》（“Tibetan Translation of Hsuan-Tsang's *Ta Tang-si-yu-ki* made by Gung Gom-bo-jab with the forward of Dr. Sh. Bira”）一文。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大唐西域记》藏译本。西藏社科院马久和阿才发表了《〈大唐西域记〉藏译本校勘》^③。文中的藏译版本并非是熟悉的152页（a、b面为一页）的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而是多出14页的另一个版本，但至今尚未公开出版。王尧先生

①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② 王尧：《〈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及译者工布查布》，《法音》，2000年第12期，第21页。

③ 马久、阿才：《〈大唐西域记〉藏译本校勘》，《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3期。

在《〈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及译者工布查布》^①和《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翻译、译者和大乘上座部等几个问题述记》^②中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大谷大学所藏木刻本，并就藏汉版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和介绍了工布查布的生平。王先生的研究因资料匮乏并非很全面，但对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基础。王尧先生门徒岗措的博士论文《〈大唐西域记〉藏译本研究》^③在比较藏汉《大唐西域记》版本的基础上，“指出了译文的创新部分和未译部分，修改了译文中的错别字和个别语法错误”。结合蒙古国关于工布查布生平资料，从历史学、语言学、翻译和药学等方面评价了工布查布，是目前关于工布查布研究的最全面的成果。次仁顿珠在藏译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同时，发表《〈大唐西域记〉工布查布藏译本疑点举隅》^④等，举例指出工布查布藏译本中人名、地名、行路方向、距离、僧人、寺庙等方面的错译，并以翻译批评的视角进行了客观评价。

总体来说，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和工布查布的生平事迹，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译文的比较、汉藏文化互动及影响，以及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古为今用”等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三、藏译本《大唐西域记》的价值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利用。2022年4月12日，《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

① 《法音》，2000年第12期，第20—24页。

② 王尧：《王尧藏学文集》第五卷，第197—206页。

③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④ 《西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76—87页。

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①明确了古籍文献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藏文古籍文献中，敦煌古藏文写本P.T.960《于阗授记》等记载了古代西域部分历史文化，但较为全面的资料甚少。藏译本《大唐西域记》不仅有效补充了藏文文献中较为欠缺的西域诸国历史、语言、宗教和地理等重要信息外，进一步助推从唐代吐蕃正式开始的汉藏文化交流交融进程，是跨文化学对内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的重要资源，可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古为今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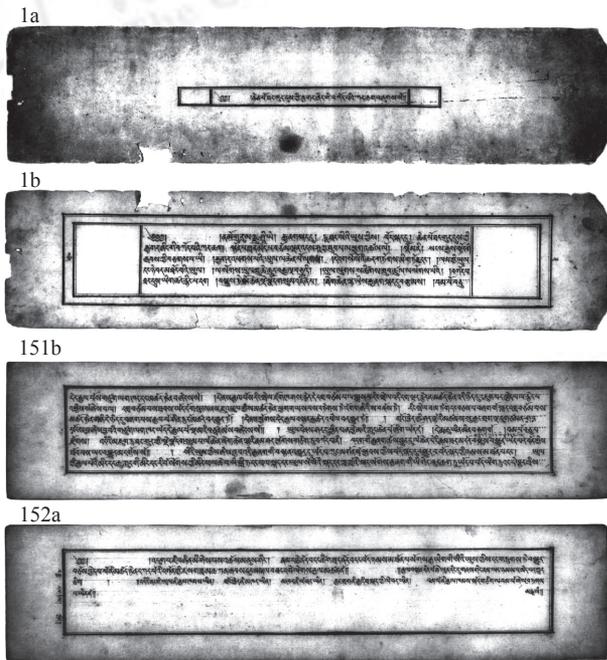


图10 大谷大学所藏藏文木刻本《大唐西域记》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4月12日，第1版。